



歌德自传

——诗与真

K835.1656

1-5

2=)

歌 德 自 传

——诗 与 真

上

刘思慕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B043185



K835.1656

1-5

222

歌德自传

——诗与真

下

刘思慕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B043186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Dichtung und Wahrheit

责任编辑：关惠文

歌德自传（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60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7 $\frac{7}{8}$ 插页9

1983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5,000

书号 10019·3491

定价 2.90 元



作者像

译者旧序

现在离歌德逝世百年祭转眼又四年了，那时世界——特别是国社党将要抬头的德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纪念歌德的热烈，读者想还记得。译者不在那时凑热闹，而在歌德崇拜的狂热已渐冷去的时候，把歌德自传译出来，诚然有点明日黄花之感，不过，这个伟大的诗人的价值不是百年的，而是千万年的，不朽的，而且他的真价不断为人重新估价，重新认识。在歌德自己著作的译本和关于歌德的文献两方面均极贫乏的中国，把歌德的作品而同时又可供重新认识歌德之助的《歌德自传——诗与真》介绍到中国来，也不是无意义的吧。

诚然，世界上研究歌德的书籍论文，真是“汗牛充栋”，自百年忌以来，又不知添了多少。可是象那些《歌德的牙齿》、《歌德时代的眼镜》^①一类的街学的琐屑的研究，固不必说，无数的资产阶级的歌德研究和批判者中能够认识歌德的真价的真不多见。有些侧重女人对于歌德的影响，有些把歌德神秘化，奉之为超越时代的天才，不是故意歪曲，便是搔不着痒处，例如法诺·莱因南德(L. Farnoux-Reinand)在《秩序》(《L'Order》)杂志(1932年3月22日)上曾说：“如不考究妇人对于

^① 前一文为柏林大学某讲师之作，后一文出自冯·弗卢格(A. von Pflugk)之手，载于1932年《德国年鉴》(《Deutscher Almanach》)。

歌德的影响，歌德的研究便不可能。”又如一九三一年夏死去之神秘主义的精神现象学的文学理论家冈多尔夫(F. Gundolf)教授，认歌德为“自我”思想的告知者，“不依系于何物，自己完成自己，与为时间所制限的存在没有关系，与目的也无关系的自律的人格”，更是极神秘之至。

国社党之也利用歌德来做他们的宣传的工具，自不待说。例如在死后百年纪念时，国社党的机关报《国民观察报》(《Völkische Beobachter》)宣称歌德为“我们德意志人”，所走的方向跟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一样。他们的理论家罗森堡(Rosenberg)更谓歌德为希特勒、蒂森之流的先驱者，在《浮士德》里高喊着独占。

事实上，歌德确是伟大的天才，但决不是超时代的天才。歌德的恋爱的生活诚然是丰富多趣的，但是给予他以决定的影响的决不是妇女。从某一方面来说，歌德是反动的，但他的反动性与德国今日的国社党不同，而且在某一方面比后者前进得多。恩格斯也称歌德为“最伟大的德意志人”，而又说：“歌德有时伟大，有时狭小，有时是反抗的，嘲笑的，轻蔑世间的天才，有时却是谨慎的满足的狭量之俗物。”

歌德的这种二重性，正证明这个伟大的天才是为他当时的社会的政治的条件所制约。歌德生当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和十九世纪的初期，法国的启蒙思想已波及欧洲，但是后进的德国还未见革命的有力的布尔乔亚的存在。歌德的生地是旧商业城市的法兰克福城，家世由商人而进为贵族，他自己后来且充当魏玛的枢密顾问官。因为这种关系，他一方面，表现出与同时代的诗人(如席勒)不同，他具有积极性，注重实践生活以至带有泛神论，素朴的唯物论的倾向，而且对于当时的社会的因袭的虚

伪的生活样式也取挑战的态度。可是，在他方面，胆小的市井商人，门阀子弟和支配阶级的根性也在歌德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例如他反对急进的法国革命，而主张进化，对于封建的绝对主义的秩序虽然从两三侧面反对，但对于伟大的历史运动却怀恐怖，后来在魏玛时代且醉心于宫廷的极微小的快乐。

不过，文学批判者之指出歌德的世界观的这种矛盾，不是对歌德个人有所苛求，而只是想从当时的社会关系中来认识真正的歌德，使后之承袭文学遗产者，抛弃这天才诗人的俗物的狭小的方面，而发扬光大他的伟大前进的方面。而且歌德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同时又不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对于犹太民族，也具同情，他虽与封建社会妥协，但对于中世纪的专制、腐败却加以攻击和嘲笑。所以大体上来说，歌德终不失为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前卫的意识的代表，不特与反犹太主义，毁灭文化，复返于中世纪的野蛮的国社党不能同日而语，而且是他们的讽刺。

欲认识真正的歌德，只有从新的社会科学的观点，把歌德的时代的时代的社会关系，以及他的一生和全部著作加以精密的研究才成。但是歌德自传之大足以为这种目的之助，是不容否认的。也许有人说，歌德自传是诗人在老年（五十九岁）回忆之作，而且只叙到魏玛时代（二十六岁）以前的事，没有别人替他作的传那样的客观和完备，不知在时代和社会关系上来描写自己正是歌德自传可以自负的地方（见原序）。事实上在自传中，藉着对于他的家庭，朋友，城市，宫廷，以及各种人物的详尽生动的描写，整个的歌德也象烘云托月那样活现出来。他所写的纵只及他一生的早年期，但恰是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他的二重性已在那时具有。例如在自传中我们看见他一方面同情于

职工，以至反抗市政府的叛徒，暴露当时封建贵族的种种腐败和虚伪，但他方面对于封建盛时的光荣犹有余恋；我们又看见一方面他的宗教是一种自然的崇拜，对于神的公平，甚至怀疑，但是他方面又称道重仪式的天主教而薄新教。凡此种种，都是他生当的过渡时代的特征。正如他自己在序文中所说的，时代给予时代的人的影响极大，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便全然不同，假如歌德迟生二三十年，歌德的思想恐怕更前进和彻底一点吧。

以文学上的价值论，《诗与真》也是值得称道的。歌德的写实主义的观察方法和描写的手腕在本书里也颇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且文笔变化多趣，有时议论风生，有时娓娓如儿女细语，有时插入戏剧性的场面，关于他的恋爱故事的记叙，又饶有牧歌的意味。所以，本书在风格上虽与卢梭《忏悔录》异趣，但同样可作文学作品来欣赏。

最后，关于本书的翻译，还有几句话要说：歌德的作品不易译，散文虽比诗好一点，但以他在自传中无所不谈的缘故，有好些典故史实，人物书名便不容易考证出来。译者之从事本书的译译，除根据德文原本之外，复参考英日译本及其他歌德传记，力求畅达，并尽可能将重要之书名、地名、人名等加注。但以浅学之故，错误之处自所不免，译者敬以万分的诚意等待着国内读者的指正。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译者新序

旧译《歌德自传》（又名《诗与真》）是歌德百年祭之后四年（1936年），我通过黄源同志的介绍，应上海生活书店之约赶译出来的。一九三二年暮春，我曾到德国作短期的学习，那时德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的盛大纪念刚刚过去，我读到了一些纪念和评价歌德的形形色色的文章。我学习的地点恰恰是歌德的出生地法兰克福市，我曾瞻礼过歌德的故居，他在《自传》里描绘的他的故乡风物和附近的古迹名胜，有相当大部分我自己也身历其境，记忆犹新，因而对于他这本名著特别感到亲切。尽管那时我只是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对德国文学和历史缺乏研究，德语未能熟练掌握，也高兴地把这个任务接受下来。

翻译工作是在日本过流亡生活时进行的，幽居多暇，只化了约一年的时间就把它完成，分上下两册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一九三七年四月先后出版。当时在我国国内郭老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早已出版（1922年），曾经轰动一时，其后还有好几种译本，歌德有些诗也译了出来（如1936年冯至同志译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但歌德其他代表作还是有待于翻译。所以希望《歌德自传》这一巨著的中译本同读者见面，多少也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可是，这个译本刚发行几个月便爆发了“七七事

变”，这本书随即绝市以至绝版了。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纷飞的年代，不但“兵荒马乱”，纸也荒，而且自己亦改行从事紧张的战时新闻工作，这类的外国文学书当然没有修订重版的机会，甚至连我身边仅存的一套样书也丢失了。只是到解放后六十年代初期，在同文化部一位领导同志偶然谈起《歌德自传》时，他热情地鼓励我设法把这个旧译本修订再版，文艺书的翻译久矣乎搁笔的我才重燃起这个死灰似的念头。刚巧文学研究会的老战友叶启芳同志在抗战末年从韶关的旧书摊上买到了我这个译本，了解到我有这个打算，便慨然把书赠给我。手头有了它，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借了一套旧版的德文本，我便开始利用工作余暇动笔在我的旧译本上做起修订工作。可是，“好事多磨”，还没有改完两章，十年内乱就已临头，检查、交代、挨批还忙不过来，当然更不容许有接触“散发封资臭味”的洋书的闲情逸致。一搁下又是十几年，只是在那位领导同志和一些老同志的策励之下，我又旧事重提，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让我修订这译本的任务，“见缝插针”，鼓点老劲先把上卷改好，于去年暮春交稿，下卷慢慢再改。但考虑到今年正好是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作为歌德晚年曾经向往和歌颂过的中国，在“换了人间”的今天，似应趁着今年歌德这个大日子，尽可能多出版一些有关这个伟大诗人的译著，以飨爱好文艺的广大读者，同时也可以提供批判地继承西方文艺的丰富遗产的材料，从而有助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新的春天的繁荣。因此，我还是贾其余勇，挤出时间，争分夺秒地把旧译本下卷也于三月以前修订了出来，作为向歌德一百五十周年祭的微薄献礼。

二

对于歌德个人的总的评价，对这本自传的评价，我在旧译本的序言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有所论列。虽然已经事隔近半世纪，这些看法还没有过时，所以我在改译本中仍把旧序保留下来。不过，在这次修订的过程中，我把全书从头到尾重读了不止一遍，同时又浏览了歌德其他一些代表作，以及有关歌德生平、思想的重要记述、《歌德谈话录》，稍加吟味，除了保持原来的看法之外，还想在新序中作些必要的补充和强调。

我在旧序中曾引用恩格斯的评语说，歌德是“最伟大的德意志人”。后来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梅林在《歌德与现代》^①一文中，又引伸恩格斯的话，高度赞扬歌德道：“所有德国文化领域的伟大人物之中，没有比歌德更真实，更伟大，更不朽的艺术家了。”诚然，歌德不仅是德国以至欧洲的一个伟大的诗人、艺术家，而且多才多艺，学识极其广博，也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科学家。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同时也兼有一些严重的弱点、缺点，也就是说，他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他的性格具有突出的两面性。恩格斯曾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②一文中对于歌德的生平、思想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矛盾，有过很精辟的分析。恩格斯写道：“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

^① 引自张玉书、高中甫、韩耀成译的《弗·梅林文学论文两篇》的译者注，载《世界文学》1979年第三期287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56页。

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恩格斯又说：“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恩格斯这两段话，不仅如实地刻画了歌德的两面性，而且指出了这是阶级局限性以及时代精神和矛盾给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歌德生当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也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太阳已在欧洲的西方冉冉升起，黑暗的封建社会已面临彻底崩溃的大转折的时代。但是歌德的祖国德国在经济上是落后的，少数商业资本家软弱无力，还是要依附封建势力而生存；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德国人民依然呻吟在封建割据的王公的腐朽暴虐统治之下。所谓“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即便以歌德生地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自由市而论，它虽然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但这时却已中落，而让位于莱茵河下游和其他地区的新兴商业城市，但这个帝国直辖市却仍保留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的残余。所以，恩格斯谈到当年的德国时愤慨地说：“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然而恩格斯接着又说：“歌德时代的德国在政治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在文学方面是伟大的。”^①而歌德就是这个时代德国的伟大文学最有代表

^① 《德国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33页。

性的人物。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得从歌德所处的时代的精神及其矛盾寻求解答。

歌德活到八十三岁的一生，尽管大体上是一帆风顺，但它的道路还是曲折而复杂的。他出生时，文艺复兴已结下丰硕的果实，宗教改革运动已告一段落，启蒙运动也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方面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接着近代欧洲以至世界又进入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①在这样的新时代精神和伟大的历史浪潮的影响、冲击之下，象歌德那样处于落后的德国，而对现实的观察极为敏锐，耽于沉思，不满现状的市民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不能无所动于中。但是，正如梅林所指出，“德国人悲惨的历史给他们带来了厄运，使他们只能在思想上和诗歌里欢迎这新的开天辟地的日子，只能在文学领域里进行他们的革命”^②。所以歌德早年曾积极参加德国文艺方面的“狂飙突进运动”，并写出了歌颂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的历史剧《葛兹·冯·伯里欣根》和《爱格蒙特》两部杰出的作品，并不是偶然。恩格斯曾推许《葛兹》是歌德“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但是，阶级的局限性却使歌德不能以积极的行动来顺应这些伟大的革命历史潮流。他认为打破

① 见朱光潜译爱克曼：《歌德谈话录》，第30页。

② 引自《弗·梅林文学论文两篇》中论歌德的一篇，载《世界文学》1979年第三期291页。

德国的丑恶现状的出路不是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通过开明君侯的适当的改良、改革措施来避免这种造成混乱和破坏的革命。他对法国大革命初则欢迎，继则恐惧以至憎恨的矛盾的态度，他对爱好文艺、貌似开明的卡尔大公爵抱有很大的幻想，甘于留在魏玛小朝廷，以枢密院重臣和贵族身分消磨了他的大半生（尽管一度潜往意大利，在那逗留了近两年），——这两事特别突出了他在政治方面的两重性中的消极的一面。^①

诚然，歌德这种两面性是同他在世界观方面的更根本的两面性有密切的关系的。比方说吧：（1）以哲学思想而论：一方面他深受斯宾诺莎的影响，崇尚自然，刻苦钻研科学，以至认为大自然本身就是神，多少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味道；但另一方面，他又倾向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甚至侈谈占梦和预感的灵验，否认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特别是编造出“精灵”那样的超自然、不可捉摸、不可解释的东西或“力量”，把拿破仑、拜伦等伟大人物的出现，以至自己的某些行动和成就，也归因于“精灵”的作用。（2）以宗教信仰而论：一方面他反对“原罪”之说，反对教会的支配权，倡言自己有自已的基督教，甚至不辞站在无神论者一边；但另一方面又说自己“相信上帝”，革命的成败取决于上帝的意旨，对于洪水与挪亚方舟的“旧约”传说也深信不疑。（3）再以社会历史观而论：歌德一方面看到时代和社会关系的影响的重要性，把个人看成是“集体性人物”，以至承认伟大人物比起整个社会来是渺小的；另一方面他又

^① 关于歌德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他在魏玛大半生的简史，请参阅朱光潜译的《歌德谈话录》和译者注的有关部分以及高中甫的近著《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1981年北京出版社版）。

看不起下层社会和群众，许多时还强调天才的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主张社会幸福应以个人幸福为前提。总的来说，歌德在世界观方面的主流还是唯心主义（带有神秘气味的唯心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是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是英雄史观，而不是群众史观。

可是，尽管我们在上面列举歌德的两面性的事例，他的弱点、缺点还是瑕不掩瑜，作为反映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精神和矛盾的诗人 and 思想家，歌德的成就和贡献是伟大的、不朽的。

三

歌德在《诗与真》第二部的卷头语题有一句古老的德意志格言：“一个人在青春期所企望的在老年便得到丰收。”这句话也完全适用于歌德本身。尽管歌德中年以后的大半生是在魏玛这个鄙陋的小公国度过的，但他的最有代表性的杰作，如《威廉·迈斯特》和不朽的诗剧《浮士德》就是在他的晚年完成的。他的副产品生物学和颜色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在这时期开花结实。以《浮士德》而论，歌德根据民间传说，在这本悲剧中通过浮士德博士的一生的发展，用艺术的手腕，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西欧的进步知识分子一辈子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和人生的意义的痛苦经历，以至在改造自然的事业中展望人类的远景。它反映了当时德国和西欧进步的科学的的力量和反动的神秘的力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歌德一生时而战斗、时而妥协的曲折经历和内心世界以及远大抱负的写照。正是由于《浮士德》及歌德其他一

些作品具有这样的特色，有点象后来列宁把托尔斯泰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那样，德国革命诗人海涅也把他的这位先辈称为“世界（指西方世界——译者）的一面镜子”。

即便以本书《诗与真》（四部）而论，也是歌德晚年在魏玛陆续写成的。^①这本自传是老诗人主要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出来的。它只叙述他二十六岁（1775年11月）动身去魏玛以前的事，也就是说，它只是他从幼年到青壮年的一段时期的回忆录，以后的大半生都付诸缺如，不完不备，象是一个遗憾。但是，如果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是记下了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思想 and 实践的经验^②的话，《诗与真》却是这位伟大诗人亲自回溯自己由诞生到成长以至成熟的历程。歌德说得好：“一个人最有意义的时期就是他的发展时期”^③。歌德对自己在这个“最有意义时期”的自我写照，正是《诗与真》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特色。

四

在改译和通读本书的过程中，译者同时就注意到，《诗与真》的特点、优点，除了上头和旧序中所指出的以外，还可以作如下的一些补充。

（1）深刻的自我解剖和坦率的自我披沥，是《歌德自传》

① 歌德于1809年五十九岁时开始写第一卷，到1811年才脱稿；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812和1813年完成；第四卷则在二十七年以后，1830年歌德八十一岁时（逝世的前两年）才完成。

② 引自朱光潜译的《歌德谈话录》的译后记。

③ 引自上述《歌德谈话录》第19页。